

党章的基本逻辑

□ 张 蔚

逻辑即思维或客观规律性，党章的逻辑就是党章的历史地位、发展进程、构成形式、主要内容、组织关系等的客观规律性。上述逻辑的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推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发展。

法规纪律逻辑。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依规治党、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是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首先，党章突出纪律建设，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其次，党章规定了对党员违反党纪的五种处分，对违反党纪的党组织问责、改组或解散。再次，党章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依照党章赋予的职权，维护和捍卫党章权威。

历史辩证逻辑。党章的演进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一方面，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变化中保持着“绝对运动”状态。从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章程，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96年的历程中制定和修改了十八次党章，并且还会在历史的前进中不断修改完善。另一方面，党章的内容在客观实际的不断变化中保持着“相对静止”状态。在十八次党章的制定和修改中，党的性质、根本宗旨、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等内容在“绝对运动”中保持着“相对静止”状态。

篇章结构逻辑。从世界政党章程结构看，基本分为总纲合立、总纲分立、无纲章程三种类型。党的七大章程增加了总纲部分，形成了纲领和章程合立的基本格局。党的十九大党章包括总纲和条文两大部分。总纲部分总述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国情、基本方略、党的建设等内容。条文部分共十一章五十五条，分述了党员、组织、党的干部、党组、党团关系、党徽党旗等内容。党章的篇章结构从宏观上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奋斗以及怎样奋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这个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事业奋斗逻辑。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建设、治国理政构成了党章的一个基本逻辑。党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改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表述。通过阶段性的逐步实现，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建设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大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治国理政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是领导一切的。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

论、基本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组织关系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党章规定了党的组织制度、组织结构、组织监督、组织象征和标志、党团关系以及同国外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党际关系。从组织制度看，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章规定了各级领导机关的产生，各级委员会与同级代表大会的关系、各级委员会的基本制度与议事原则；各级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选举办法、任期制，新组织成立、原有组织撤销、派出代表机关、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的原则，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内容等。从组织结构看，党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同时，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从组织监督看，规定了各级纪检机关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上下级纪检机关、各级纪检机关和同级党委的关系、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同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等。从组织标志看，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从党团关系看，党章规定了共青团的性质、领导及内部关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

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

党员关系逻辑。以党员为中心，构成了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党的领导人的党内关系，党员与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国外政党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党外关系。第一，党内的基本关系是平等和团结。党员、党员干部、党的领导人在享有权利、履行义务、遵守党纪国法、参加组织生活等方面是一律平等的。但是，平等是相对的。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的更高要求；坚持“四个服从”，特别是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员干部要善于团结同志，全体党员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义务。第二，党群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党员来自人民群众，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团结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第三，党员干部要善于同党外干部合作共事，尊重并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第四，在坚持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从党内到党外，层层带动，形成了以党内团结统一为中心，与党外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胞侨胞，乃至世界各国政党和人民的大团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党建视角

延安时期加强党支部建设的举措

□ 王思林

延安时期我们党以支部建设为重心的，围绕组织功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适应了复杂社会环境和主体利益多元对党组织的挑战，既提高了社会整合能力，也提高了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开展支部党员的大学习、大讨论

陕甘宁根据地先后下发过《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识字运动月工作决定》《边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消灭党内文盲问题的通知》《边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等几个重要文件，要求“各地在党内尤其在每个党的支部中须作最好的传达解释，提出每个党员都应参加学习，并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教育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下的阶级教育，党的思想意识的基本教育，以及各种社会常识、文化识字教育。教育的形式灵活多样，包括在日常工作中个人自修、集体研究；开展识字竞赛、对识字模范进行物质奖励，有计划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和党校的轮训。在支部教育方面，每月开设一次到二次训练班，每个老党员都受到10次以上的训练，普通党员至少受训一次，使普通党员对党、对马列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另外，支部还组织进行各个时期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及单项重要问题的传达与讨论，组织开展各级的研讨会与各种文件（党的许多决议和报刊社论）的支部讨论，使一般党员在辩论中更加了解当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方针政策。

重新登记党员，清除坏分子

在党员入口方面，陕甘宁边

区在《关于改进支部工作的指示信》中强调：“应具体的有计划的发展党的组织，党员入党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并一定要举行入党仪式（宣誓），并对新党员应有必要的教育。”在党员出口方面，针对党员队伍结构的变化和思想观念方面出现的问题，各抗日根据地纷纷采取多项措施来严密巩固党的组织。一是切实深入地审查支部的组织成员，审查的对象不仅是一般的党员，干部也同样需要审查，并且是从各方面审查，特别注意成分问题，把真正的坏分子洗刷除去；二是重新登记党员，强化党员意识，通过党员登记工作来一次对党员的基本教育，做到每个党员起码懂得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加强党员对于自己光荣称号及对党的认识；三是加强党员考核，清退坏分子。从党员登记中精确考查各抗日根据地内部党员入党后成分变化的具体情况。同时，对于在党员登记过程中发现的过于落后、在群众中不但无信仰，且有很坏影响不能教育者，予以适当洗刷，并要特别注意清除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分子，以此来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的信仰。

明确党员标准，严明党的纪律

陕甘宁边区党委一开始提出的党员登记的标准是“对人公道，对自己模范，经常开会，缴纳党费”。随着登记工作深入和抗战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945年西北局组织部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积极分子的入党标准为：“好劳动、能公道、能工作。”对于在职党员标准为：“热心工作、主张公道、积极生产、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勇于革命”等新的标准。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各个抗日根据地将根据地的教育和执行做到了有机的统一。一方面，通过教育

使每个党员懂得：“只有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才算真正遵守了党的纪律。每个领导干部懂得，只有自己积极为党的任务而奋斗，才能以自己的模范提高党员的纪律性。”另一方面，纪律只有被严格执行，才会被敬畏。1940年《边区党委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对于开除党员党籍的意义、程序进行了阐述，并在第一条明确指出，“开除党员党籍，是党内纪律制裁的最高表现”。根据1939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关于边区党员干部情况统计表》开除洗刷党员调查表显示：陕甘宁边区共开除洗刷党员1383人，其中，叛徒26人，自首308人，勾匪67人，来历不明27人，逃跑90人，哥老会99人，宗教41人，贪污204人，贿赂93人，不工作301人，地主15人，其他112人。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党的纪律执行的严肃性。

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制度建设

为了使支部能有单独的工作能力，支部生活能真正活跃起来，成为领导群众的核心，必须重视基层组织的制度建设。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建立支部的经常会议生活、工作制度。克服支部工作的被动性，建立经常的工作计划、具体分工及工作检查。各种会议须按期召集，事先有充分准备，一般支委会每10天召开一次，支部干部会半月一次，小组会7天一次，党员大会三月一次，其他重要会议可以临时召集；每次会议时间，小组会不超过一小时，其他会议至多不超过三小时。支部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计划与检讨党政军民的各种工作。建立严格的报告与检查制度。要求乡上给区上每5天一报告，区上给县上7天一报告，县上给分区

10天一报告，分区给边区15天一报告。上级对下级要有严格的检查制度，这种制度要成为经常的。除开会检查外，还须用个别的检查，如检查出各种弱点，应当给以立即的具体指示，绝对不要拖延。

开展巡视巡察，注重分类指导

延安时期党的巡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38年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党的委员会为了了解下面的情况，便利于工作上的指导起见，上级党委得向下级党委派遣巡视员，传达上级党委的意见，考察下面的情形报告上级党委。”边区和各分委、特委组织巡视团，深入区、乡开展巡视。其中，边区巡视团深入到区及主要乡，分委、特委巡视团主要深入农村，通过巡视发现了问题，整顿整治了一些软弱涣散的基层党支部。另外，在党员的成分，党员的地域分布，组织的集中程度，工作性质及作用，在地方党支部、机关党支部、学校党支部、工厂党支部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对此，各抗日根据地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非常注重不同性质支部的科学设置和分类指导。如陕甘宁边区规定，“支部工作的原则应该是以根据于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根据支部所在机关部门的不同性质与党的一般工作的规定，按照不同时期、不同条件来决定自己具体的实际的工作任务”。如行政机关的支部应保证行政工作的完成。学校支部应保障教育计划的完成。工厂支部应保证提高技术与生产计划的完成等。

以史为鉴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中共因素

□ 程曦敏

南长沙，著名剧作家。1926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从事进步戏剧的创作。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该社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南国社的进步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30年3月，社团被查封。此后，田汉率社团全体成员毅然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田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著名音乐家。聂耳小时候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白天在外面听到曲子，晚上就能唱给家人听。1930年夏，聂耳来到上海，1932年在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当时，田汉常去该团，两人由此相识。接触后，田汉发现聂耳思想进步且很有才华，就积极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剧联下属音乐小组的成员。

对于文艺及音乐，两人志同道合，均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文艺工作必须面向社会现实，唤起与鼓舞民众的爱国热情。为宣传抗日，田汉与聂耳并肩战斗，在《义勇军进行曲》之前，两人合作创作了诸多抗日歌曲，包括《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前进歌》等，均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田汉、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2月，《风云儿女》剧本交稿不久，田汉就被国民党政府以“抗日反政府”罪名逮捕。聂耳对此义愤填膺。对于聂耳来说，田汉既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也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合作伙伴，既是良师，亦是益友。他主动向夏衍请缨，要求承担主题曲的作曲任务，他说：“作曲交给我，我干！”末等夏衍开口，他便伸出手与之握手，再次表示：“我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夏衍后来风趣地说，谱曲的工作是聂耳“抢”来的。

为了谱好曲子，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曾向《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提及，“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管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当时聂耳经常去司徒慧敏家做客，每次谱完曲，他都会充满激情地唱给众人听，司徒的母亲亲切地称之为“起来”先生。

根据夏衍的回忆，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聂耳未来得及谱完曲就去了日本。出国前夕，他赶出了曲子的第二稿。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乐谱离开上海，下旬，歌曲在东京定稿，并邮寄给了电通公司。

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对歌词作了细微修改。田汉的原稿如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聂耳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是“每一个人”改为“每个人”；二是在“我们万众一心”前加了三个“起来”；三是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四是在最后一个“前进”后再加了一个“进”。对于聂耳的修改和谱曲，田汉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聂耳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不过，无论是田汉还是聂耳，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享年23岁。当月，田汉出狱，随即得知聂耳遇难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

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共创作了35首歌曲，其中与田汉的合作最多，共有14首，其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开矿歌》和最后一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均是田汉的合作，两人可谓是近代中国音乐史上当之无愧的“黄金搭档”。因为失去了聂耳这样的好搭档，田汉此后再也没有写过歌词。

田汉曾这样评价他的搭档聂耳，他说：“一个人的死常常容易考验他生前给人印象的深刻程度。但凡你心中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那样忘不了你，始终记忆犹新地纪念你”，“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这既是对聂耳的评价，也是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好诠释。

史海拾贝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义勇军进行曲》自1949年9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正式成为国歌后，2004年3月宪法修正案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2017年9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由田汉与聂耳作词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最初问世是作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其诞生与我们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电通影片公司是在党的影响下建立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众抗日救亡呼声日趋强烈。1932年秋，夏衍等人受党的指派进入上海电影界，1933年3月，成立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在此之前，在党的建议和筹划下，上海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美术家联盟、教育家联盟，这些都是党在文化领域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电影小组的建立，也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负责拍摄《风云儿女》的电通影片公司，它的成立与党的电影小组直接相关。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堂兄司徒逸民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电影器材公司，名为“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该公司成功研制了“三友式”录音机，打破了外国在电影录音方面的垄断地位。此后，司徒慧敏根据夏衍的指示，和司徒逸民等人集资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春，在电影小组的支持下，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司徒慧敏担任制片主任，夏衍等人负责影片选题。随着左翼电影界人士的加入，该公司成为上海左翼电影的阵地。

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主题曲《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上映后大受欢迎，《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风云儿女》是电通影片公司的第二部影片，主要讲述了知识分子由象牙塔骤然走向抗日战场的故事，电影剧本和主题曲由田汉负责。后来公司还拍摄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1935年底，电通影片公司因经济困难和国民党当局迫害而停业，公司旧址于1937年毁于日军炮火。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均为中共党员

田汉与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两人均为中共党员。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出生于湖